

1990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

——以“中国传播研究系列”为视角^{*}

刘 兢

摘 要：本研究试图以“中国传播研究系列”为视角，呈现1990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的基本脉络。作者认为，从“中国传播研究系列”来看，1990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传媒研究向主流中国研究靠拢。第二阶段，华裔学者要在中国传媒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阶段，中国传媒研究呈现世界眼光。学者们开始结合全球化、传媒新技术等大背景讨论中国传媒问题。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对中国大陆传媒研究的启示是：中国传媒研究同时是中国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转型中国的传媒，也要积极描摹传媒中的转型中国，提升与中国传媒相关的研究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中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传媒研究；海外；范式；1990年以来

作者简介：刘兢，男，讲师，博士。（华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系，广州市信息传播与创意产业重点研究基地，广东 广州，510631）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2-0001-08

在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学术地图里，李金铨主编的“中国传播研究系列”无疑是最重要的地标之一。他利用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持“中国时报传媒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机缘，将对中国传媒有兴趣的美国传媒学者、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和前驻华记者们的文字组织起来，并加入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传媒学者、相关人士和华裔传媒学者的讨论，汇成了这四本中国传媒研究论文集。梳理以“中国传媒研究系列”为代表的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学术路径，反思我们自身研究中的问题，对于提升中国大陆传媒研究的学术水准大有帮助。

一、《中国的声音》与《中国传媒、传媒中国》： 向中国研究靠拢的中国传媒研究

与当前英语世界里日渐红火的中国研究相比，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曾经可不那么热闹。赵心树（1993）曾表达了华人传播学者在美国从事中国传媒研究的困惑，说他们只有从事与美国相关的研究才可能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术界的认同。这样看起来，《中国的声音》和《中国传媒、传媒中国》表现出的打通“中国研究”与“中国传媒研究”的努力，就愈发显得难能可贵且顺理成章了。一方面，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传媒学者和前驻华记者们描绘了“他们眼里的中国”和“美国传媒里的中国”；另一方面，传媒学者和一些前大陆人士则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近现代中国传媒变迁的生动画卷。

成长于中国之外的西方中国研究学者和前驻华记者们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中国传媒吗？这是《中国的声音》的卷首之问。很多时候，身居庐山的人们可能看不清真相，反倒是一些山外人倒可能提

^{*} 2010年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1951—2008年）”（WYM10068）的研究成果。

供一些独特认识。“关于中国的源自习得的知识，并非为华裔垄断”，^[1]李金铨在为英语世界里的中国研究和中国传媒研究正名。从这一层认识出发，西方中国研究学者和前驻华记者们在这里讲述的中国和中国传媒的故事就有了与中国大陆的同类研究不一样的风味。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这两本书中展示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及局限，并对如何突破这些局限提出了建议。政治学者沃马克（B. Womack）的文章关注向西方打开国门之后近现代中国的困境。在他看来，现代中国总是希望摆脱却始终无法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而西方对中国来说却总是兼有学习范本和显在威胁的双重面目；现代中国传媒也是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后的奇妙果实，它们源自西方，“是现代中国最西方的元素之一”，却又受东方传统影响，终究难逃“正统传播者”的宿命。^[2] 治明史的范德（E. L. Farmer）结合自身经历，描述了冷战对美国人头脑中的中国大陆映像的影响。冷战时期的美国人只能主要依靠搜寻二手资料、访问中国流亡者、从香港隔岸瞭望中国大陆，这必然形成一些信息失真；而美国国内一些人的冷战思维又进一步限制了美国的中国研究。^[3] 政治学者何汉理（H. Harding）则阐明了饱受质疑的中国的中国研究群体中记者、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将三者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指为提升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条通途。^[4]

学者们对美国的中国报道的描述保持了他们应有的冷静立场，而前美国驻华记者们也在他们那些糅杂了宏观认识与个人感受的文字中坦诚地反省了自己的中国报道体验。李金铨对美国国际报道的点评辛辣老到、一针见血：“美国传媒倾向于将国际新闻本土化为美国主旋律的变奏”^[5]，美国的中国报道大抵也若是。张瓚国整理了1950—1984年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头版中的所有涉华政策新闻，发现美国政府是这些新闻的主要消息源，一些匿名官员也时常会在制定涉华政策过程中利用传媒放风以探测民意。他的结论印证了李金铨的观点，“美国涉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策新闻，都是透过华盛顿的眼睛来看的”。^[6]

欧迈可（M. Oksenberg）和索尔兹伯里（H. Salisbury）都清理了美国记者报道中国的历史。前者回溯了20世纪以来报道中国的三代美国记者的命运，认为中国多样的文化、悠久的历史 and 中西文化差异是西方记者认识中国的三大障碍，而美国的中国报道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其摇摆性，受中美关系左右太大。后者是曾亲身报道过中国的名记者，他透露的前美国驻华记者们的秘辛自然引人入胜。他从报道延安的“三S”（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讲到了逐渐认清重庆国民政府腐败真相的白修德，还念念不忘杨尚昆主席在他写作《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时给他的热情帮助。^[7]

范德（E. Farmer）和贝内特（A. Bennett）叙述的前美国驻华记者们的事迹更发人深省。范德将美国驻华记者的理想勾勒为做“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与最重要的受众”之间的桥梁，而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想看且只能看到的中国只是一个反衬美国自身问题的乌托邦，“美国对中国的热情的起落，更多地与美国发生了什么相关，而非与中国发生了什么相关”。^[8] 20世纪70年代很有一些美国人觉着正深陷“文革”的中国不错，那是因为他们对策动越战的美国不满。有过多年中国报道经历的贝内特追忆了他的在华岁月，从远渡重洋的离愁别绪到采访中国人时的种种际遇。他深刻地反思了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美国记者报道中国时的偏见，“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被压制的声音被过于相信。而官方的声音之所以不太被信任，仅仅是因为它们相对位置而已”。^[9]

对现代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中国传媒变迁的描绘是这两部书的重头戏，一些传媒学者和其他行当的学者纷纷发言。传媒学者们对1978年以后中国传媒变迁的叙述都是对“中国传媒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变化”这一宏大主题的具体诠释。李金铨断言划定（中国）传媒改革边界的关键在于“经济改革和对西方的开放是否影响了党的调控”^[10]，这一认识与潘忠党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的认识遥相呼应——“中国（传媒）的改革是在不变中求变，以变来实现不变”。^[11]

波伦鲍姆（J. Polumbaum）曾是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外籍专家。她通过问卷和访问发现，同时服务

两大目标、新闻调控过当、报道特定新闻受阻与相对独立性不足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记者心中新闻改革的四大难题，而人们普遍将改革的前途寄托于市场^[12]。她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媒管理体制变革的观察，是传媒调控在法治要求下日趋规范（成立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管理规章），而对非政治新闻的调控则更富弹性。^[13]李良荣教授是这两部书的作者中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新闻学者，他对“客观报道”在近现代中国的流变的爬梳走的是从社会看传媒的路子。客观报道在中国的命运绝非传媒自身所能左右，这“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也反映了不同政治派系中传媒的功能和不同意识形态潮流下传媒的地位”；他视传媒结构变革为彻底实践客观报道原则的前提，“客观报道原则，只有在中国传媒结构变革之后或以信息而非宣传为焦点时，才能被彻底践行”。^[14]

李金铨和陈韬文等对台港传媒与政治之间关联的研究互为映衬，一个点出了政治同仁刊物在台湾政治变迁中的作用，一个着眼于社会权力结构变动之下香港传媒与记者的变化。^[15]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笔下的中国传媒也更多地与政治相关。中国研究专家戈德曼（M. Goldman）和前驻华记者胡德（M. Hood）的目光都落在中国传媒与高层政局的关系之上，继承了一些西方研究者从传媒内容的字里行间洞悉中国政治风向的传统。^[16]

二、《权力、金钱与传媒》：政治经济视角下的中国传媒

如果说《中国的声音》和《中国传媒、传媒中国》里沟通“中国研究”和“中国传媒研究”的努力要解决的是“中国传媒研究研究什么”的问题，那么《权力、金钱与传媒》首先要解决的，则是“谁来研究中国传媒”的问题。英语世界里的中国研究向来由英美裔学者担纲，著名的《The China Quarterly》杂志的顾问委员会里只有一名华裔；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也曾如是，朱谦等主编的讨论中国政治传播问题的《中国新社会网络》里满是英美裔学者的文章；声称根据实地访问写出首本谈论中国传媒的英文专著《中国大众传播》的霍金斯（Howkins）是个英国人。^[17]《权力、金钱与传媒》打出了以华裔为主的中国传媒研究的旗帜，一批在英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话语、熟谙中国世故的华裔学者集体亮相，就中国传媒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指向是将中国传媒研究的内外视角接合起来，兼具内部视角的一手经验之长与外部视角的分析省思之妙。^[18]

《权力、金钱与传媒》的主线，是从政治经济视角来认识改革年代的中国传媒变迁，这与许多西方中国研究者看待改革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路一致。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是政治体制变化不大背景下的经济改革，“由于社会主义实践所留下的制度遗产，使党国势力的‘惯性’仍很强，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制约，使得经济运作中存在着很多非经济因素，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自然成为学者观察中国制度变迁的工具”。^[19]解剖1978年以来由经济因素引发的中国传媒改革同样无法忽视其中的政治逻辑，“矛盾的中心在于政治控制和经济改革这两套逻辑怎么斗争，怎么调和……而在这场活生生的斗争过程当中，新闻媒介受到什么冲击，扮演什么角色，而记者又如何想办法在夹缝中求生存？”^[20]

李金铨在该书导论中厘清了他眼中西方传媒政治经济研究的两条路径及从政治经济视角观照中国大陆、港、台三地传媒变迁的意义。激进马克思主义者揭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导致的传播不平等，国家是资产阶级工具，资本集中限制了传媒多元化；自由多元论者强调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家对传媒自由的可能威胁，市场成了促进传媒多样化、消解专制权力的动力。从政治经济视角看中国大陆、港、台三地传媒，大陆传媒正在体验国家推动下的集团化，台湾传媒业已从政府支持下的寡头垄断期进入了市场竞争期，而香港传媒却在经历政局不明朗状态下的传媒合并。^[21]

吴国光、潘忠党与何舟同为出身中国大陆的华裔学者，他们在书中对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传媒变迁的研究相互补充，暗合邹谠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将宏观社会结构分析和微观行动分析结合起来的主

张。^[22]吴国光的研究力图从整体诠释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报业结构的流变。政治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去中心化、传媒资源打破国家垄断后的社会化和传媒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是他心里中国大陆报业结构流变的几大动因;这些因素作用下的中国大陆报业,“从以政治为中心变成以经济为中心……从国家垄断结构变成了碎片化的多元结构”。^[23]潘忠党与何舟发表的两份关于当代中国大陆微观新闻实践的报告皆源自田野,二人凝练出的核心概念都令人印象深刻。潘文的核心概念是“临场发挥”(improvising),即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记者们策划、实施那些非常规新闻实践并使之正当化的那些方式”。中国大陆新闻体制的延续性,决定了记者们只能在高扬党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前提下,用“临场发挥”的方式进行一些非常规新闻实践,“这些形成非常规实践的过程,抛弃了任何明显的意识形态对抗表象”。^[24]潘忠党笔下记者们的“临场发挥”连成了一卷当代中国大陆传媒的浮世绘,记者们会写软文、接受企业赞助和拿红包,传媒组织也会涉足房地产、印刷业甚至保健品业。“临场发挥”多与经济诉求有关,不大涉及政治,但其之于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意义依然不可估量。何舟以深圳特区报业集团为个案,将当代中国大陆新闻实践的种种变化都归因于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拔河”(a tug of war)。二者的互动在特区报集团日常实践的几大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面对惨烈的广告和报业市场竞争,经济因素逐渐在特区报人的考量中占了先机;政治力量仍主导着集团高层人事,经济力量在集团中低层人事和财务方面的影响则越来越大;记者个人的心理、人身和观念也在市场的作用下增加了变数;报纸则在保障政治性要闻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内容多元化。^[25]

《权力、金钱与传媒》中发表的关于中国大陆传媒与社会问题的报告,还有陈韬文对香港电视影响下的广州受众的调查、骆思典(S. Rosen)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青年报》上的社会话题争论的分析和李(T. Lee)做的关于中国大陆传媒在法律体系中的角色的研究。陈韬文在抽样调查了1993年8月—9月期间广州市核心四区居民收看香港电视节目情况后发​​现:看过香港电视节目的广州观众不再只看大陆电视节目;他们对大陆电视节目的评价也有所降低;娱乐成了他们眼里电视的主要功能。^[26]骆思典(2000)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青年报》上关于何智丽事件等争议性事件的讨论,认为组织这些争论成了该报的一种市场手段。作为一名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美国学者,李(2000)认识中国大陆传媒的视角是独特的;在她看来,它们是法律的传播者和解释者,有些时候甚至还成了法律的实施者。^[27]

该书最后三篇报告是港台传媒研究,它们使书中展出的中国传媒学术拼图更加完整。李金铨追溯了香港政治变迁的历史及其对传媒的影响,并分别叙述了持左中右三种立场的香港报纸的变化,还把专业主义视为香港记者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弱者的武器”。^[28]潘忠党等人(2000)的研究则聚焦于中国大陆、港、台传媒中的“香港回归”,对比了三地传媒在报道这一媒介事件时脚本的差异。魏然(2000)关心的是1983—1993年期间台湾报纸上的大陆新闻;他从传媒看社会,企图透过扫描台湾主要报纸报道大陆新闻的人员、篇幅、内容等方面的变化,呼应这段时期台湾政治生态的沿革。^[29]

三、《中国传媒,全球脉络》:

传媒中的全球化中国,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

“中国传播研究系列”的收官之作,是《中国传媒,全球脉络》一书。据李金铨事后讲,该书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试图回答“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媒介的角色是什么,全球力量和国内势力又如何互动”。^[30]笔者认为,该书延续了《中国传媒,传媒中国》的开阔思路,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及其在传媒中的镜像,并同时锁定“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这一全新理论议题不放。

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浪潮兴起以来,全球化中国就成了国人讨论的热点之一,人们关心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位置及应该扮演的角色。李金铨在导论中全面分析了中国传媒上的全球化论争的意识

形态光谱，从传统左派对全球化时代中国道路的忧虑，到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派对全球化的大力鼓吹，到马克思主义改革派对马列主义的当代意义的重新诠释，再到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左派对“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有中国特色的、以大众为基础的浪漫民主形式”的追求。^[31]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与全球化中国随行的另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因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而复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等一系列事件中达到高潮。骆思典(S. Rosen)的报告保持了他对当代中国青年问题的一贯关注，希望能建立“中国青年对待美国的态度”与“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的张扬”之间的勾连。他总结了《青年研究》等中文刊物中的一系列青年调查报告，向英语世界披露了中国大陆青年看待美国的双重心态，“他们敬慕他们所了解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却高扬民族主义，质疑美国的动机及其海外行径”；^[32]并把这一现象归结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面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一面强调向世界开放的结果。

传媒中的“全球化中国”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赵月枝、波伦鲍姆(J. Polumbaum)和张瓚国分别从入世、申奥与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互访这三大焦点事件切入，对传媒中的“全球化中国”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游戏规则进行了解码。赵月枝选取了1999年11月10日—12月10日之间中国报纸上的499篇与WTO相关的文章为样本，阐释了它们的倾向、消息来源和叙述策略等情况。她对中国传媒上的“入世”故事作了有力批判，“在普世性话语和广泛合理性的外衣下，精英利益被表征为普遍利益；传媒声称代表的‘普通大众’，只是股民、专家和城市消费者而已”。^[33]波伦鲍姆(2003)展示了三个版本的北京申奥故事：国际奥委会之所以选择北京，是因为北京的承诺体现了中国的诚意，将奥运交给北京也能体现其对亚洲的慷慨；《新闻周刊》等美国精英传媒习惯于将北京申奥与人权挂钩，反映了美国传媒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除了推动奥林匹克，中国申奥另一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成就。”张瓚国(2003)从叙事学入手，比较了ABC中的“江泽民访美”(1997年10月)和CCTV中的“克林顿访华”(1998年6月)。ABC的江泽民访美报道以人权、台湾和中美贸易逆差为背景，关注中国的人权和宗教问题及美国人对它们的看法；CCTV则积极评价克林顿访美，回避莱温斯基等敏感话题。^[34]

李金铨在本书中的第二篇力作呈现了1990—2000年之间《纽约时报》上的涉华社论和专栏文章中流露出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观，让人们见识了美国精英传媒建构的“全球化中国”。《纽约时报》的涉华社论代表报社发言，多持中间立场，力图在美国的人权价值观与在华商业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守派专栏作者主张围堵中国，将中美贸易与人权挂钩，谴责克林顿用人权换贸易；自由派专栏作者则倡言拥抱全球化中国，支持中国入世，宣称全球化是改变中国的外部动力。李金铨对美国精英传媒上的这些讨论早已见怪不怪，称之为“建制内的多元主义”。这些讨论看似多元，却受官方既定视野局限，倾向于用美国价值观看外国，还通过“中立的社论+立场分明的专栏”造成了百花齐放的面貌。^[35]

学者们在《中国传媒，全球脉络》中生产的另一部分知识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直面新媒体科技与全球化给中国大陆传媒带来的影响。麦康勉(B. L. McCormick)和刘擎想抓住互联网与传媒商业化背景下中国大陆“公共领域”转型的轨迹。他们肯定了互联网对中国的意义，一般民众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信息分配日趋平等；但又对互联网的解放性持保留意见，因为“新媒体技术的影响，既由其特征决定，也由应用它的机构和个人决定”^①。商业化的中国大陆传媒更关注普通民众的讨论，但这些讨论离“公共领域”的理想国还很远，“一个建立在消费性娱乐商品之上的公共领域，只是政治

① 周永明同样看重在中国引进新传媒技术的过程中人的重要性，认为“在决定技术如何被使用的过程中，政府或个人的政治需要常常起了关键作用”。参见 Zhou Yongming (2006),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0。

讨论的脆弱桩脚”而已。^[36]陈韬文(2003)点中了“传媒的行政管理边界”这一至今仍困扰中国大陆传媒市场的死穴,认为新媒体技术是解穴的希望所在。市场化的中国大陆传媒有了跨地区扩张的冲动,而按地域管理的传媒体制是抑制这一冲动的最大壁垒。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中国大陆传媒得以冲破行政边界发展,而地域限制对互联网根本没有意义。^[37]

全球化对中国大陆的宏观传媒格局的短期影响不会很大,来中国大陆抢滩的跨国传媒大亨入乡随俗,定将保持政治正确;^[38]行政指令下组建的传媒集团在大方向上依然会按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运作。更值得关注的是微观层面传媒组织的话语及实践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何舟、潘忠党和陆晔的报告都遵循了这一理路。何舟(2003)从组织协调理论出发,探讨了当代中国大陆传媒应对组织内部不协调现象的五大高招:用爱国主义对报道话语中的意识形态重新定调、区隔市场性内容和宣传性内容、开办市场导向的子报以拓宽报道内容、用合同制调动记者的积极性及寻求国家的政策保护。^[39]潘忠党和陆晔试图还原当代中国大陆新闻界对专业主义话语的吸收与实践,再现形成记者们脑中“记者是谁?是做什么的?社会角色、实践原则和评价标准是什么?”这一意义体系的过程^①。他们调查了中国大陆四个城市的至少20家传媒机构,发现记者们心中的优秀记者形象正在悄然生变;官方会运用一些组织手段巩固记者的传统职业意识,记者也会利用专业主义话语资源制造自己的职业想象。二人的结论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新闻实践正在修改着舶来的专业主义理念,这揭示了“社会结构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40]

四、讨论:中国传媒研究的省思

为何要认识中国传媒?如何认识中国传媒?——这应该是深藏于从事中国传媒知识生产的学人心中的两个终极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取向不同的学人们的回答自然不同,人们对学术取向与资源分配之间的纠葛从来就心照不宣。有人可能会对“中国传播研究系列”的学术取向产生一些质疑:它们对中国传媒问题的批判可能有迎合西方主流传播研究价值观之嫌;它们对研究地点、访谈对象的选择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些研究者自身偏好的指引;它们只聚焦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大城市的传媒,显然无法反映中国传媒的全貌。但是,笔者认为,只要相对远离了大陆学术政治的这些研究,展现了与大陆同类研究不太一样的取向,它们对开拓我们的传媒研究的学术视野的意义也就足够了。

关于后一个问题,“中国传播研究系列”的经验更是意味深长。传媒研究在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自有公论,许多其他学科的学人都可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研究与传媒相关的问题,为传媒研究提供理论资源^②;而传媒研究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辐射却有限,《中国社会科学》上至今只发表过一篇传播学者的报告^③。李金铨在《中国传媒,全球脉络》里总结了“中国传播研究系列”的主旨,“打通理论与经验研究,为传媒研究和中国研究架桥,催生中国传媒研究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41]这是一条可供大陆中国传媒研究借鉴的思路。中国传媒研究应是中国研究与传媒研究的结合,传媒里的中国是中国变迁的日记;关于中国传媒的组织、内容生产的知识,则是关于中国的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单波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反思言简意赅,直言“我们并不缺少传播学的知识,我们缺少的是与中国传播问题相匹配的智慧”。^[42]在大陆传播研究的学术重心从对西方传播学

① 陆晔和潘忠党的另一篇中文报告可与此文相互补充。参见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北:《新闻学研究》,2002年4月。

② 如王绍光对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③ 参见葛岩、秦裕林《Dragon能否表示龙:对于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知识的引进转入对中国传播自身问题的反思时,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无疑是我们亟待借鉴的资源之一。很多时候,了解他者怎么看待我们,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 [1] Lee C. C.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28.
- [2] Womack B. "The Dilemma of Centric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230.
- [3] Farmer E. L. "Frost on the Mirror: An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n the Cold War Era",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1994: 266.
- [4] Harding, Harry, "Journalists,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e Cas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 [5] Lee, C. C.,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20.
- [6] Chang, T. K., "Reporting U. S. - China Policy, 1950 - 1984: Presumptions of Legitimacy and Hierarchy",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201.
- [7] 参见 Oksenberg, M., "The American Correspondent in China",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Press, 1994; Salisbury H. E., "China Reporting: Red Star to Long March",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 [8] Farmer, E. L., "Sift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Reports as Interpreter of China",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243; 250.
- [9] Bennett, A., "American Reporters in China: Romantics and Cynics",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271.
- [10] Lee, C. C.,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3.
- [11] 潘忠党. 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8(6): 6.
- [12] Polumbaum, J.,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s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 in Lee C. C. (ed.), *Voices of China*, Guilford, 1990.
- [13] Polumbaum, J., "Striving for Predictability: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Media Management in China",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1994: 114.
- [14] Li, L., "The Historical Fate of 'Objective Reporting' in China",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1994: 225; 235.
- [15] Lee, C. C.,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Press, 1994; Chan, J. M., Lee C. C., and Lee P. S., "Fighting Against the Odds: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1994.
- [16] Goldman, M., "The Rule of the Press in Post-Mao Political Struggles",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1994; Hood, M., "The Use and Abuse of Mass Media by Chinese Leaders During the 1980s", in Lee C. C.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Westview, 1994.
- [17] Chu, G. C. and Francis L. K. Hsu, *China's New Social Fabric*,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3; Howkins, John, *Mas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Longman, 1982.
- [18] Lee, Chin-Chuan,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Lee C. C.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 [19] 王信贤. 当代西方“中国研究”之新制度典范分析[J]. 中国大陆研究, 2000(8): 25.
- [20] 李金铨. 从文化中国看当前中国媒介的深刻变化[A]. 何舟, 陈怀林. 中国传媒新论[C]. 香港: 太平洋世纪, 1998: 7.
- [21] Lee, C. C.,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Lee C. C.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31.
- [22] 邹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204.
- [23] Wu, G., "One Head, Many Mouths: Diversifying Press Structures in Reform China", in Lee C. C.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47.
- [24] Pan, Z., "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Lee C. C.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73; 74.

- [25] He, Z.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 of – War: A Political –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 in Lee C. C. (ed.) ,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3.
- [26] Chan, J. M. , “When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Television Clash: The Impact of Hong Kong TV on Guangzhou Residents” , in Lee C. C. (ed.) ,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4.
- [27] Rosen, S. , “Chinese Media and Youth: Attitudes toward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Lee, T. V. , “The Media and the Legal Bureaucra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in Lee C. C. (ed.) ,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8] Lee, C. C. ,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Structure,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 in Lee C. C. (ed.) ,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7.
- [29] Pan, Z. , Lee, C. C. , Chan, J. M. , & So, C. Y. K. , “One event, three stories: Media narratives from cultural China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 in Chin – Chuan Lee (Ed.) ,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Wei, R. , “Mainland Chinese News in Taiwan’s Press: The Interplay of Press Ideology,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and News Structure,” in Lee C. C. (Ed.) , *Power, money, and me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0] 李金铨. 超越西方霸权[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320.
- [31] Lee, C. C. ,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of the Chinese Media”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19 – 22.
- [32] Rosen, S. , “Chinese Media and Youth: Attitudes toward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102.
- [33] Zhao, Y. , “ ‘Enter the World’ : neo – 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50; 51.
- [34] Polumbaum, J. , “Capturing the Flame: Aspir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Beijing’s 2008 Olympics”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Chang, T. K. , “Political Drama and News Narratives: Presidential Summits on Chinese and U. S. National Television”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 [35] Lee, C. C. , “Established Pluralism: US Elite Media Discourse about China Policy”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79 – 81.
- [36] McCormick, B. L. and Liu Q. ,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Media: Technologies, Content, Commerce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Public Sphere”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143; 140.
- [37] Chan, J. M. ,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Media Marke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ewspaper, TV and Internet Markets in China”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 [38] Lee, C. C. ,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of the Chinese Media”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10.
- [39] He, Z. , “How do the Chinese Media reduce Organizational Incongruence?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in the Name of Communism”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 [40] Pan Z. and Lu Y. ,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229; 231.
- [41] Lee, C. C. ,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of the Chinese Media” , in Lee C. C. (ed.) ,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3: 24.
- [42] 单波. 如何表现中国传播研究的智慧[J]. 新闻大学,2008(2): 49.